

容闳
论
略

宋佩华

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爱国者,在他青年时代远涉重洋肄业国外时,就立下“为中国谋福利”^①的宏大志愿。那么,他一生的爱国活动怎样?从中可以总结出哪些有益的东西?本文就此探讨如下。

负笈异域 志在兴邦

容闳(1828—1912年),名光照,字纯浦,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南屏乡(今珠海市南屏镇)人。童年就读于澳门教会小学和香港玛礼逊学校,因家境贫寒而辍学,当过小贩和印刷工人。一八四七年,容氏被玛礼逊学校校长、美国人塞缪尔·布朗带到美国,在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攻读。三年后,考进耶鲁大学,成为中国留美的第一个大学生。孑然一身的容氏,在学期间,除了有限的助学金外,主要靠半工

半读弥补不足。一八五四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获文学士学位。

的报国之心,是何等急切。

在容氏求学期间,正值清朝政府腐败衰落,危机四伏,屡遭外来侵略的时期。在侵略者面前,清政府屈膝投降,丧权辱国,容氏尤为不满,他曾说:“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②于此表现了他的爱国丹心。

条练方策 致力改革

容氏回国后,屡遭冷遇,他的“为中国谋福利”的抱负无法实现。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四处奔走,先后在广州担任美国驻华代理公使伯驾私人秘书,在香港高等审判厅当过翻译,还到上海海关翻译处工作。在上海几家洋行任职期间,曾经到过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采办丝、茶。所经地区,容氏目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城乡,痛感中国劳动人民“生计事业几已十夺其九”^③。

容氏在美国看到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与腐败黑暗的中国相比较,感到要使中国富强,只有效法西方各国,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这种认识,不仅使他确立了“为中国谋福利”的学习目的,同时也使他为达到这个目的,发愤学习新知识、新思想,并在比较中西两种社会制度中,“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④,以期将“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⑤。一八五四年,容氏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谢绝了待遇颇高的工作,毅然回到阔别八年的祖国。正如他的友人吐依曲耳所说:“虽然他无从预料什么会降临到他头上,他还是决心回去”^⑥。可见,容氏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容氏来到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希望通过早先在香港认识的干王洪仁玕实现他谋求中国文明富强的计划。早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爆发后,在国外的容氏即给以深切的关注。他不只一次地写信给香港的友人了解太平军活动的情况。回国后,在广州看到两广总督叶名琛血腥镇压天地会的残暴行为,“乃深恶满人之无状,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

当”^①。由于对太平军产生了好感，容氏曾跑到天京打算参加农民革命队伍。当他抵达天京时，洪仁玕“极表欢迎”，诚恳邀请他“赞助天国，共襄大举”。容氏深受鼓舞，他向洪仁玕提出了七项建议：

（一）按照西方军事制度，编练一支新式军队；（二）设立一所武备学堂，专门训练各级军官；（三）创办水师学堂，培训海军；（四）组织一个文官政府，聘请有才干经验的人充当各部门的顾问；（五）设立银行，厘订度量衡标准；（六）设立各种民众学校，将《圣经》列为教科书；（七）设立各类实业学校^②。从这七项建议来看，显然，容氏是想效法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教制度，对落后贫穷的中国进行全面改造建设，这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积极表现。由于这些设想有不少地方与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不谋而合，因此，干王对容氏的建议“何者最佳，何者最要”都发表了“殊中肯綮”的意见，并封给他“义”字四等爵位。洪仁玕的热情接待和认真倾听建议，给容氏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称赞他“久居外，见闻稍广，故较各王略悉外情”^③。尽管此行颇为顺利，但由于当时在太平天国地区还缺乏实施资本主义方案的环境和条件，容氏的七项建议也和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一样，成了一纸空文，无法付诸施行。

天京失望归来，容氏怀着郁郁不乐的心情，暂时从事于商业活动。到一八六三年，经友人李善兰的推荐，他到安庆与两江总督曾国藩会面。这时曾国藩正在兴办洋务，准备筹购西洋机器，制造新式枪炮镇压太平军，因此有意委派容氏出洋办理此事。当然，购置外国机器发展生产，是容氏改造建设中国计划中一个重要内容，但他与曾国藩不同的是，一不是为了屠杀

人民，二不能满足于设厂制造，还要使中国拥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免始终依赖于外国。尽管看法不同，但容氏还是表示愿意接受曾国藩的委派，并天真地希冀能借助洋务派的政治力量，实现他梦寐以求的学习西方，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宿愿。这年十月，容氏得赏五品军功，奉命赴外国购买机器。一八六五年，所购机器一百数十种陆续运抵上海，交江南制造总局使用，清政府正式授予容氏五品候补同知官衔。一八六八年，江南制造局已逐步扩大，容氏认为中国的工厂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掌管，因而他向曾国藩提出在局内附设兵工学校的要求，“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④。曾国藩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久设校培训，为洋务运动培养了第一批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

然而，容氏不满足于在中国发展机器工业，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向清政府提出以前在天京建议过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构想。一八六七年，容氏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军机大臣文祥提出四条建议：（一）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势力插手，特别强调“公司须为纯粹之华股，不许外人为股东。即公司中的经理、职员，亦概用中国人；（二）“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为国家培养人材；（三）“开采矿产以尽地利”；（四）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⑤。这四条建议可以说是容氏向太平天国提出的七项建议的继续和补充。

条陈呈送上去后，却久久不得答复，直到一八七一年，四条建议中的第二条，即选派出国留学，终于获得清政府的批准。这是因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当时正在举办洋务“新政”，亟需各种技术人才，所以支持了容氏的意见。第二年，

清政府任命刑部主事陈兰彬和容氏为正副监督,首批留学生三十人于八月抵达美国。按照当时拟定的计划,总共选派一百二十人,四年内分批遣送出国,每年三十人。容氏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不可抹煞的。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开创了向西方学习的新风气。容氏在外国多年所学的是西学。他一直认为如果不去吸取西方新思想、新知识,怎么能够突破旧的传统观念,为振兴国家民族做一番事业呢?可是,留学生在学习内容和生活方式上的新变化以及容氏竭力支持的态度,国内封建守旧势力却认为是严重的“离经叛道”;洋务派认为有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信条。就在容氏遭到“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的一片攻击声中,清政府于一八八一年,命令将留美学生一律撤回。容氏积极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教育计划在封建顽固势力的摧残下夭折了。他想依靠洋务派势力实现改造和建设中国的美好愿望,也最终破灭了。

保护华工 参加变法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横行霸道、侵犯主权的各种侵略活动,容氏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严正而鲜明地表示反对。在上海海关工作时,对中国职员不能与英国人享受同等权利一事,他曾向税务司李泰国提出抗议。一八七四年,日本侵犯台湾,容氏竭力反对美国支持日本的阴谋活动。他尤其痛恨外国教会以及洋教士在各地包揽词讼和干涉中国内政,认为只有严加禁阻,才足“以防外力之侵入”^⑩。容氏在美国孟松学校读书期间,已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但他回国后,却丝毫不加掩饰地揭露殖民者借传教为名,行侵略之实的罪恶行径,这是难能可贵的。

以上所为,并非偶然。容氏在担任留学生监督期间,曾竭其全力保护在海外惨遭欺凌迫害的华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殖民者在中国沿海各地疯狂掠夺“猪仔”。对此,容氏早有所闻。他到美国留学后,又目睹华工屈辱受害的惨状。归国时,“甫抵澳门,第一遇见之事,即为无数华工以辫发相连,结成一串,牵往囚室,其一种奴隶牛马之惨状,及今思之,犹为酸鼻”^⑪。由此可见,容氏对殖民者在中国掠夺劳动人民的罪恶活动,是深恶痛绝的。一八七四年,李鸿章同秘鲁签订《中秘通商条约》和查办华工专条时,秘鲁专使葛尔西耶曾声明今后一定要切实“保护华工,尽除弊端”^⑫。但事实并非如此。鉴于在秘鲁的华工一再向清政府控诉惨遭摧残凌虐的情状,因此,李鸿章在订约之前已派容氏到秘鲁进行调查。容氏奉命查出在秘鲁的华工约有十二万余人,其中“受虐以及病亡,难以数计”,还有不少人在雇主奴役下“已经做满八年,仍勒令再做三、五年及十余年不放者”^⑬。并了解到秘鲁在中国非法掠夺人口,实与“外国所禁贩卖黑奴相似”,贱役华工也“甚于犬马”^⑭。经过容氏的多次交涉,秘鲁被迫先放回华工八十人。事后,容氏将调查所得给李鸿章写了一份报告,并附有华工证词,各种记录函件照片。李鸿章看后说:“其华工受苦之地方,受苦之时候,及欺凌人之姓名皆确有可凭”^⑮。第二年,他就以容氏提供的材料为证,向来华办理换约事宜的秘鲁专使爱勒谟尔提出严厉质问。爱勒谟尔在事实面前,只好承认容氏的调查“算得凭据”^⑯。而且不得不在换约时,在照会中声明今后给华工“最积极的保护”。由于容氏在调查和保护秘鲁华工这项工作中“能殚心竭力,不辞劳瘁”^⑰,因而得到清廷的“奖励”,并于

一八七五年冬任命他为出使美国副公使。在担任副公使期间容氏义正词严斥责秘鲁勾结美国继续拐卖华工；抗议美国各地掀起排华恶浪。以上事实表明，容氏不愧是一位认真保护海外侨胞利益的爱国外交官员。

容氏虽然长期在国外担任留学生监督和办理外交事务，但是他人人在海外，心向祖国，始终没有忘却仿效西方改造中国这件大事。自从清政府宣布撤回留美学学生后，容氏进一步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黑暗，深感“中国根本之改革”是件“不容稍缓之事”。一八八一年容氏任职期满回国销差，他在北京上海所接触到的大小官员，几乎无不搜括自肥，挥霍无度，根本不关心国计民生和民族存亡。在改革无望的情况下，他悄然赴美。然而，挫折并没有使容氏消沉下去。当一八八四年、一八九四年先后爆发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他又向清政府建议，立即向国外借贷巨款，购买兵船，雇用军队，坚决抵抗日本侵略。并不顾六十七岁的高龄，于一八九五年重返祖国。他“恨中国之败，慨然作积极进行之想”，立即向张之洞提出一个“新政”方案，中心内容是聘请外国人充当外交、军事、财政顾问，仿行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对中国逐步进行有效的改革。随后，容氏又向清政府提出筹办国家银行和修筑铁路的建议。以上这些主张和办法，都寄希望于英美各国的支持帮助，当然是不切实际的，也是行不通的，但却反映了容氏盼望中国能以西方国家为榜样，革故鼎新，振奋图强的迫切要求。

就在容氏一次又一次提出改革措施时，康有为、梁启超等爱国知识分子，也在积极进行维新变法活动。一八九八年，容氏在北京结识了康、梁等人。根据他的

观察和了解，认为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是一批立志改革、利国兴邦之士，光绪帝也不失为一个贤明有为之君。于是他与康、梁等人来往频繁，并参与了一些活动。他在北京的住处，“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在康、梁等人的心目中，容氏这时不仅是他们的同道，而且已成为具有某种特殊影响的维新变法积极分子和重要人物。政变发生后，容氏虽然也在被捕之列，但他挺身而出，前往美国公使住处商议营救，由于清政府搜捕甚紧，他被迫化装逃沪避难。

容氏原想与维新派同心协力，用温和的方法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但这个努力并没有成功。在残酷的事实面前，他认识到要使中国的改革事实真正实现，必须采用强有力的手段。戊戌变法失败后，唐才常积极筹备“自立军”起事，容氏表示支持。一九〇〇年七月，在上海张园召开的会议上，容氏被推选为“中国议会”会长。八月，“自立军”起兵计划败露，唐才常被捕杀，容氏也遭到通缉，不得不再一次化装逃亡香港。在维新变法这个问题上，容氏从原来的主张和平改革转变为后来的支持武力解决，应该说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但他是想在事成之后，废慈禧，拥光绪，这就说明此时容氏的思想还停留在改良维新的认识阶段，对光绪皇帝抱有很大的幻想。

转向革命 拥护共和

戊戌变法失败后，在维新派中逐渐发生了分化，康、梁等人坚持改良道路，变成了保皇党，另一部分维新人士则开始同情和倾向革命，容氏是属于后者的代表人物。他回顾了四十多年来先后依靠太平天国、清政府、洋务派以及资产阶级改良派谋

求改造和建设中国的经过,从中吸取了失败的教训。尤其维新变法受到镇压,给他很大的震动,使他开始认识到,中国要得救,只有寄望于正在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力量。

容氏这一重大的转变,是与下列事实分不开的。在逃亡香港期间,他与谢纘泰、杨衢云等革命党人多次接触,曾在一起“讨论了政治局势”^⑩。在他们的启发和影响下,容氏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宗旨和活动,开始有所了解。但是,这时容氏在思想上还没有与康、梁决裂,而革命派也正在争取同康、梁合作。由于容氏逐步趋向革命,而且在维新派中声望很高,因此,谢纘泰等人准备推选他为“维新联合党派的主席”^⑪。他在促进两派联合中做了一些工作,是应该肯定的。容氏思想转变的另一因素,是受到孙中山的启迪和帮助。“自立军”起事计划失败后,一九〇〇年九月初,容氏离沪逃往日本,在船上与孙中山相遇。在此之前,孙中山已久闻容氏之名,在争取同康、梁合作时,他就认为容氏是一位颇孚众望的领袖。这次晤面,容氏对孙中山的印象是:“其人宽广诚明,有大志”,“并助以华盛顿、弗兰克林之心志”^⑫。孙中山也在事后说,容氏“声望素著,富新思想”。初次会见,两人谈得很投机,后来在日本横滨旅社又“闭户密谈甚久”^⑬,大有相见恨晚之概,从此两人交谊深笃。容氏决定追随孙中山,积极支持他的革命事业。

容氏表示支持革命,所以,一九〇二年谢纘泰、李纪堂等人准备在武装起义夺取广州建立临时政府时,“以容氏为法学博士为总统”^⑭。但这次起义事洩失败,容氏离港赴美。为了争取外援,这年九月,谢纘泰函请容氏“在美国组织秘密社团,并为争取美国朋友和同情者的合作和支持

而努力”^⑮。容氏欣然接受了谢的委托。一个多月后,他回信说:“一方面,我自己作好准备;另方面,我将尽我的能力满足你们的需要,请尽早将暗号和密码寄来。”^⑯可见,这位爱国老者,已在海外担负起筹建秘密机构和联络工作了。一九〇七年,孙中山在两广策划武装起义,给革命同志极大鼓舞。这年七月,谢纘泰接到容氏寄自美国的一封信,看后高兴地说:“他保证继续支持我。”^⑰后来,容氏又来函,满腔热情地提出一个“促使革命成功的计划”^⑱。

容氏希望康、梁与革命派联合谋事,并协助他们在海外筹款准备建立一支“维新军”,走上武装起兵道路。然而,由于康、梁执迷不悟,不断阻挠和破坏革命,容氏到一九〇八年七月,“谴责康有为及其保皇会”^⑲,表示与他们分道扬镳。随后,容氏就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在海外积极奔走,全力支持革命。他一方面在美国开展宣传活动,鼓动美国人民大力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一方面联络美国军事学家荷马李和财界人士布思,要他们从军事上和经济上赞助孙中山。一九〇九年冬,容氏与孙中山在美国第二次见面。在畅谈革命大计之后,他向孙中山提出了一个“红龙中国”的起义计划。第二年,由于容氏的介绍,孙中山曾与荷马李和布思进行几次会谈。后来,这个起义计划虽然没有实现,但它表明了容氏在辛亥革命前夕对国内发动武装起义的深切关注和竭力支持的积极态度。

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康、梁的保皇面目更加暴露。特别当容氏了解到康有为吞没华侨捐款进行投资活动时,他气愤万分,在一九一〇年四月十三日给谢纘泰的信内,“强烈抨击康有为及其信徒”^⑳。这就说明容氏已是更

坚定地站到革命的立场。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这时已是八十三岁高龄的容氏,还从遥远的异国,给国内友人数致书信,热情洋溢地表达了他对革命胜利欢喜雀跃和为革命前途无比担忧的心情。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下旬,卧病在榻的容氏致函谢缙泰,提出了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一些看法,他敏锐地看到“掠夺成性的列强在北京,将有压倒一切的权力左右袁世凯、唐绍仪一伙”^⑪,并将支持他们“控制新政府,就简直如同满洲清政权重新执政一样糟糕”^⑫,同时指出:“新中国应该由地道的中国人管理,而不应由骑墙派和卖国贼掌管,因为他们让欧洲掠夺者干预我国的内政。”^⑬最后他建议:“应该立即组织并成立临时政府,以便展开工作,并使社会秩序和治安恢复正常状态。”^⑭概括起来,就是迅速建立革命派掌握的革命政权,警惕帝国主义扶植袁世凯之流窃夺革命果实。辛亥革命后的事态发展,完全证明容闳这些忠告并不是多余的。

另外,容闳在给谢缙泰的信中,还有一个致革命领导人的“附件”。在这个“附件”中,他强调了四个问题,(一)必须高度重视这次革命的巨大作用。他看到在短短的期间内,革命力量就以摧枯拉朽之势,迫“使清政府不得不跪地求饶”。因而欢呼这是一次“了不起的大革命”^⑮,它的深远意义是为“子孙后代开辟了一番多么壮丽的事业”^⑯;(二)革命胜利后,一定要建立“共和制度”。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民一致的呼声,“民声即天声”^⑰,顺应历史潮流,“建立一个模范共和国”^⑱,是当务之急;(三)要保卫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他告诫人们,袁世凯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是帝国主义最“赏识的人”,而且善于“伪装”,对他的话“一点儿也不要相信”、“必须把他

和满洲人一齐撵走”^⑲;(四)千万要搞好革命内部的团结。他一再嘱咐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领导人,“你们互相间应当比亲兄弟还要密切,紧紧团结起来”^⑳,“在任何情况和理由下,你们都不应该互相纠纷,陷入内部争执和内战的深渊”^㉑,如果在革命内部出现了分裂和争斗,结果“肯定会导致外国干涉”^㉒,从而在中国出现瓜分新危机。容氏提出的这些问题,既重要又及时,然而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辛亥革命后,革命派不但未能同袁世凯等人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在革命内部也没有搞好团结。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软弱和帝国主义的破坏,终于使袁世凯的阴谋得逞。中华民国成了一块空招牌,容氏所担心的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容氏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和对革命的关怀,除了通过书信表达自己的深厚情感和提出积极的建议,还希望能够回到祖国,亲自目睹开国盛典。可是,这时他已身患重病,只好用颤抖之手握笔驰函谢缙泰,通过他向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同志致以祝贺之情和钦敬之心。他在信中说,孙中山当上“新生的中华民国的新总统”^㉓是当之无愧的,特别嘱托谢缙泰在孙中山宣誓就职时,一定要将这一“典礼”盛况及时告知他。此外还要谢转告孙中山三事:一是“千万替我向他致以衷心的祝贺”^㉔;二是告诉他,“我的健康情况逐渐好转,或许会到中国来,参观参观这个新共和国”^㉕;三是“我希望能活到看见我的朋友当选下届大总统”^㉖。容闳长期居住海外,对孙中山以外的其他革命领导人,他是闻其名未见其面,因此,他怀着极其仰慕的心情在信中表示:“我真希望在没有死之前,能够和其他革命领导人亲自认识认识”,他们的革命功业,应永远“铭记于人们的心中”,“受到人们的纪念”^㉗。

以上容氏这些重要意见和衷心祝愿,被孙中山称为来自“太平洋对岸老同志”深深热爱祖国发出的“欢悦之声”、“令人闻而起舞”^④。在他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便向这位“老同志”发函,诚恳地邀请他回国共议国策,同建民国。信中热烈赞扬容氏晚年在海外不辞劳苦,“谋复满清之专制而建伟大之事业;以还吾人自由平等之幸福”^⑤的革命精神;还称道他“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才才智学识,练达过人”,恳请他“当此破坏后,民国建设,在在需才”的时刻,能返回祖国为“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之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⑥而贡献力量。可是,这时容氏已处在弥留之际,无法接受孙中山的邀请。在病床上,他叮嘱两个儿子务必回国追随孙中山为革命效力,以继承自己晚年未竟之志。逝世时八十四岁。

一代先驱 永垂青史

在近代史上,先后涌现了许多为拯救国家危难,谋求振兴中华,历尽艰辛,毕其一生,不断探索救亡图存方策的先进人物。容氏就是他们之中杰出的一位。

容氏是中国第一代留美学生,针对中国积贫积弱的国情,他制订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并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一切机会,力图获得推行,实现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他向太平天国提出的七项建议,是企望在中国实现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也是他向中国输入西学的开始,这个纲领与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应同样受到重视,而以光辉的一页载入中国近代史册。容氏堪称为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他为洋务派购置机器,是近代中国引进国外成套设备的第一人,在建立和发展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方面起了倡

导的作用。他历次向洋务派提出的兴教育、办工厂、开矿山、设银行、筑铁路等要求,实际上就是给太平天国建议过的七项建议的补充发展和具体化,这与洋务派标榜的“自强求富”有本质的不同。在一八七二年实现派遣留学生这件事上,容氏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在近代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对后来继续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起了带头和推动的作用。此项创举,容氏首居其功,开风气之先。在戊戌变法中,容氏观点鲜明,态度坚定,最大限度地做了他当时所能做的事,是维新变法运动中积极的一员。晚年,容氏居住海外,依然深切想念祖国,一方面为争取外援奔波劳碌;一方面向国内革命同志提出重要的建议和告诫。他忠实地追随孙中山,是革命派中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在辛亥革命中,他在海外为革命努力活动,起到了国内革命同志所不能起的作用。

容氏多年居住国外,系统接受资本主义教育,而且曾经加入美国籍和皈依基督教。象这样一个在当时被人们看做是从思想到生活已经“西化”的知识分子,所以能在毕业后回到国内,并自始至终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去世时还以未能为新生的共和国效力而引为毕生憾事,究其原因,首先是他对民族和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容氏在国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也没有忘记哺育过他的祖国人民。因此,他痛恨殖民者的“放恣”入侵,威胁国家民族安全;他不满清政府的黑暗统治,认为中国之所以每况愈下,“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他还深深同情和关心“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的祖国人民。在居住美国的最后十年中,他“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可以说,容氏是忧国一生,殚心竭力报国一生。其次,容氏在寻找救国方策和探索振兴中华

道路的过程中,能够顺应历史潮流,不断前进。他曾经同洋务派共事近二十年,当他发现投靠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时,便转而站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队伍,冒着风险积极从事维新事业。最后,看到改良之路在中国行不通,同时在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推动下,改变了自己的主张和立场,逐步倾向革命,由一个君主立宪的支持者变成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拥护者。第三,容氏具有不畏艰难,不怕挫折,百折不挠的精神,在任何逆境中,他的爱国救亡的信念从没有动摇,他的积极建议,虽多次遭到冷遇,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主张,而是不断汲取经验教训,由力主教育实业救国,而转变到政治改良救国,又转变到武装革命救国,在困难中不断摸索前进。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改革家和革命者,容氏从青壮年到年逾古稀,为了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不懈不怠,奋斗终生,功不可没,可嘉可敬。然而他也和同时代的其他优秀人物一样,在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从事的社会活动中,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容氏竭力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但他又未能认清西方殖民主义的贪婪凶恶本性,幻想美国和其他国家会真心实意帮助中国,因此他在推行各种改革方案时,一直把争取外援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十分错误的,容氏虽然看出清王朝的腐败统治是中国不能强盛的根源,但又认为有曾国藩等人物出而振作图强,国家的情况或许会一天天好起来。在戊戌变法期间,他甚至认定只要去掉一个慈禧太后,换上光绪皇帝,从此就会励精图治,国强民富

了。他也赞扬过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并受其鼓舞,然而由于他的资产阶级立场所决定,却从基督教影响的角度去理解太平军的兴起。因而不但看不到农民革命的社会根源及其正义性,反而进行了种种责难。以上这些表现,说明容氏在当时不可避免地也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纵观容氏一生,不停顿致力于振兴中华是其主流,深怀赤子之心效忠祖国是其本质,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⑤,永远值得后人颂扬和怀念。

①②③④⑥⑦⑧⑨⑩⑪⑫⑬ 容闳:《西学东渐记》,见《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出版,第59, 61, 58, 62, 83, 70, 94, 120, 121—122, 132页。

⑤ 容闳:《西学东渐记》《附录》,见《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出版,第166页。

⑭⑮⑯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三),第1063, 1043, 1079页。

⑰⑱⑲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三,第23—24, 25—26页。

⑳㉑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308, 309页。

㉒ 刘禹生:《载世堂杂记》,中华书局,第114—115页。

㉓ 转引自吴相湖:《民国百人传》,第一册,第330页。

㉔—㉕㉖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312—330页。

㉗㉘㉙ 《国父全集》,台湾1974年6月再版,第三册9—183页。